

杜轶：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化学博士全奖

杜轶

男，陕西人

1996 年考入北大化学系

1998 年在新东方学习

TOEFL 成绩 657 分，GRE 成绩 2200 分，TSE 成绩 50 分

奋斗语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specialty

只要努力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就是一个有成就的人
签证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记住要坚持，千万不要从精神上放弃

前途展望

未来五年，在分析化学研究领域里有一些建树

在国外找一份工作，积累工作经验

至于更遥远的未来，我会回国，为国家做点事情

到远方找寻生命之星

出国,找寻化学的前景

徐*：你去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读化学专业,据我所知,中国学化学的学生获美国 PhD 金奖的人比较多,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杜：化学是一门比较偏理论的学科,中国的学生可能比较偏向于理论研究,理论基础比较扎实,而美国教授对中国学生的理论基础比较欣赏,所以招收的中国学生可能就会多一些。

徐：美国本科生读化学和中国本科生读化学,他们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杜：我个人认为美国学生学化学可能更注重于兴趣。而中国学生有高考的压力,可能就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如果分数不是很高的话,可能就没有自己选择专业的权利。

徐：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生选专业没有美国学生自由。有一次我去美国遇到以前新东方的一位教师,他在波士顿大学教哲学。他说,美国的哲学系实际上是法学院的预科班。也就是说在美国读哲学的学生,大部分都会转到法学院学法律专业,将来做律师。学化学专业的同学可能是为了学医。也就是说在美国,人们学理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进入一个 professional 的领域,这点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你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你认为中国

* 采访者徐小平,本书编者。

学生学化学将来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杜：我说一下我们同学的毕业去向：45%的人出国，25%的人保研，剩下30%的同学自谋出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自己学习一年再出国留学。真正工作的人只有一小部分，而这些同学所从事的工作和化学专业有关的也不多。

徐：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的大量人才实际上是没有目的的，因为出国留学不是目的。举个例子，学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可以出国留学，也可以不出国，因为无论出国或不出国，他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你刚才说你的同学中毕业后有25%的人保研，但他们上研的目的还是为了出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化学教育机器，有没有给我们的学生界定一个明确的职业目标？

杜：准确地说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我个人在大学里感到，学习化学我并不明确将来要做什么，它只是给你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让你自己去考虑将来适合做什么。比如说无论你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还是分析化学，老师在课上都会告诉你，化学是各门学科的中心，材料、生物、医药等各门学科都离不开化学。你现在的只是在为将来的方向打基础，将来会向更多的应用方向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之所以学化学专业的有这么多人出国留学，目的是希望自己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后，在国外找到化学的一个更好的应用前景。

徐：化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但这只是你们的教师给你们启发，还是教学大纲或教育部的一种思想，有没有与此配套的学制或体制？

杜：毕业时我们和老师有过一些这方面的交流，我个人认为北大化学系的教学灵活性不够。

徐：实际上你的看法基本上也代表了大多数同学的看法。如果北大这种中国最好的大学只教给学生一种基本的化学理论，并没有有组织、有系统地安排学生们朝着实用的方向走；结果大批的好

学生毕业都出国留学了,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预科,你认为这是一种喜剧还是悲剧?

杜:这是很无奈的事情。

徐:那这就是一种闹剧。叶朗是现在的北大哲学系主任,他说:哲学还是有用的,在经济社会人们更需要哲学的指导。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也可以说是在新形势下为哲学找到一处出口。但是叶朗没有想到,在美国这种教育制度下,哲学是法学院的预科,学哲学的学生就是未来的律师。学哲学的去做律师,他会有深邃的思想,有着宽广的人文化的境界,这样美国的哲学系就会以此为自豪。而中国哲学系出来的学生的出路在哪里?出国的出国,改行的改行,悲惨的悲惨。你是学化学的,又在中国最好的大学,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认为中国的化学教育应怎样做?

杜:我认为首先要注重人才基础的培训,尤其是在数学、外语、计算机等方面要加强,对于化学课程本身,要注重和前景的应用结合,对于理论方面的知识要适当淡化。也就是说在本科时不要在理论上钻研特别深,要告诉学生化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以及发展前景。

也就是说要学会从化学专业更容易地切入其他专业,能更迅速地找到为社会做贡献的途径。

但现在北大化学系更注重理论,想培训出理论家。然后去搞研究,做课题。

徐:北大化学系想培训化学方面的理论家,但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多的化学理论家?

杜:实际上我认为中国不需要这么多的理论家。比如我们化学系每届有150人,但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都出国了,在出国留学的同学中,将来真正从事化学专业的人不多,很多人都跳到和化学不相关的专业去了,如计算机、MBA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可能在国外国外生存第一吧,很多同学为了找到好工作不得不改行。

徐：如果四年教育只是使许多人进入一种无奈状态，那么这种教育体制就不能在急剧发展日益变化的社会面前给青年们提供一种能力，只能顺着他们人生的直觉面发展。假如倒退四年，让你回到本世纪末四年前，你希望这四年的北大生活怎么过？

杜：我想多学一些数学，多学一些计算机，多参加社会活动，多结识一些朋友，能够更多地充实自己。

徐：你现在拿到美国大学的全奖要去留学，如果再让你重新选择未来，你怎么选择？

杜：我还是要出国留学。

徐：去学什么？

杜：还是学化学。

徐：那么五年或者十年以后你准备做什么？

杜：我想从事分析化学方面的研究，希望在这个领域里有一些建树，至少能让我的 PhD 物有所值。我并不是因为兴趣才选择了化学，而是选择了化学以后对它发生了兴趣，所以我希望能在这个领域做出一些成绩，这是我未来五年的打算。至于更长远一些的想法，我希望自己能在国外找到一份 job，比如说国外的药厂、医院的研究机构、食品检测中心或环保部门等都需要分析化学专业的人才，我可能到这些机构去工作，积累一些工作经验。至于更遥远的未来，我想我会回国，为国家做点事情。

徐：那么你对你未来的打算或前景有信心吗？

杜：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在国外除了学习化学外，我还想学习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比如我会拿一个 second degree。虽然这些知识可能和专业知识没有什么关系，但对我的发展可能会非常有用。而在国内，虽然我的专业知识很扎实，但我可能没有精力去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

徐：你刚才提到你可能会在国外拿一个 second degree，你会倾向于学什么专业？

杜：我想会学经济专业或学习 MBA，但如果没有钱或没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些商学院的课程。

徐：如果你只选商学院的课程而拿不到学位的话，这并不能给你 job opportunity，假如你将来去竞选一个具有领导性质的研究职位。比如，我有一个朋友是医药学硕士，同时又有 MBA 学位，他的工作是搞市场调研，单位给他三百万加元研究一个课题。他没有工作经验，但一去以后，就迅速做了领导，因为他有 MBA 学位，否则他只能在部门里做一个小职员。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杜克大学毕业的生化博士，博士毕业后又取得了 MBA 学位，而他现在做的就是管理工作。你是学化学的，如果你再拿一个 MBA 学位的话，那你将来求职时就会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下面问你一个比较尖刻的问题，你觉得中国的化学人才是不是培训得太多了？

杜：当初刚入学的时候，我们也曾向学校提过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明白，学校为什么要招这么多化学专业的学生，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这是学校的规定。

徐：这实际上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杜：但据我所知，在国外学化学专业的也比较多，但他们将来不一定都从事化学工作。比如洛杉矶大学 Irvine 分校 36% 的学生是来自学生物专业的。

徐：在国外本科学习是打基础的，本科学化学的，可能将来会去学生物医药，还要再学习几年。所以说他们本科学化学只是为将来学医或其他专业打基础，你本科学的是化学，这样你就有资格进入医学院。但中国学医的人，本科就在医学院，所以学医的人自然科学基础不够扎实，而学化学的人自然科学基础太强了，但又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浪费。你北大化学系的 150 名同学，其中想改行的有没有一个改行的体系？

杜：没有明确的改行体系，只是在大一结束时有一个转系的机会，你

只要通过系考试,就可能转到别的系,学习你所感兴趣的专业。刚入学时,我们化学系共有 170 来人,后来有十几个人大一结束时转到其他系了。

徐: 1996 年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天津大学学化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在北京混了一年多,然后开始玩计算机。他做第一代的网管员,1997 年用 B1 签证去了美国,一到美国就找到了年薪 5 万美元的工作,当时美国因特网刚刚崛起,给他提供了很大的发展机会。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学理的同学比较多,但他们在中国又没有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要么像你一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要么看准社会上的机会,迅速转到其他行。否则学习纯理论,不仅在中国没有发展,在美国或加拿大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杜: 我有一个伯父是学习化学的,移民加拿大,他的专业是物理化学,比我的专业还要理论化。他现在虽然也找到了工作,但他刚到加拿大时找工作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徐: 你得的是全奖, I-20 表上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多少?

杜: 学费是每年 25000 美元,生活费是每年 16600 美元。

徐: 也就是说学校每年要给你 40000 多美元,这样五年下来就是 20 多万美元,你拿到学位以后可能会留在美国工作,也可能回国发展,你怎么看待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投入高额奖学金这种现象?

杜: 我个人认为美国人还是在使用我(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比如说我在签证时非常自信,这当然和看您的《美国签证哲学》受到的启发有关。我为什么会自信,因为是美国人给我奖学金请我去学习,我有自己的价值,而且在那边能够体现出来。我在那边一面做研究,一面还要给教授干活,因为我要做 TA,带实验室工作,这也是比较辛苦的,这样他们就不用再请人了,可能省更多的钱。如果签证官还不给我签证的话,这样他们就会犯错误。所以在签证时我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会拒签我,当然拿到签证

以后看到和我背景差不多的同学被拒签,心里还是有点后怕。

徐:美国的奖学金有很多种,其中的确有一些是美国慈善家出于慈善目的而设置的,还有一些是官方出于美国整体的沟通和交流这样的目的而设置的,但总的来说,美国大部分奖学金都是为体现中美交流、中美合作这个目的。中国需要了解美国人,美国也需要了解中国人。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美国本科学生真正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并想做博士的并不多,他们大多选择 professional school。美国的大学一些叫 academic school,主要开设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专业;一种叫 professional school,主要开设教育、医药、管理等专业。这一点美国和中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你曾说这个学校的化学专业在美国排名第五,据你了解,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怎么样?

杜: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全校历史上共有 14 位教授得过诺贝尔奖,有一个物理系的教授曾得过两届诺贝尔奖,化学系有十几个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但化学系好像还没有教授得过诺贝尔奖。

徐:你现在确定导师了吗?

杜:没有。因为我到那边是做 TA,这样我就有权和所有的导师谈话,然后再选择我的导师。另外,据我的一些师兄建议,选哪个导师要以毕业后是否能找到工作为准。有的导师研究的专业可能比较偏理论,这样他们带出的学生就很难找到工作。有些导师研究的专业本身就和一些大公司有横向的合作项目,这样他们带出的学生毕业后可能就很好找工作。当初在联系时,很多人都说要和教授套瓷,但我认为本人如果英语基础不是很好,想套瓷难度太大,我个人在申请时就没有套瓷。

徐:这样来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选择导师已经有了一个 your own choice,如同我知道哪种咖啡好,这样我就买哪种咖啡,否则人家给你一杯咖啡,结果一喝是苦的。这也是中国学生在出国留学

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新东方，给孤独前行者力量

徐：下面谈一谈新东方。你在新东方上过三门课，你认为在新东方除了可以得到卓有成效的出国考试培训外，还得到了什么？

杜：我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我个人准备出国留学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我的 GRE 考得比较糟，只有 2000 分。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这个分数很难申请到好学校。后来我就考 TOEFL，托福还考得不错，考了 657 分，对我的鼓舞很大。于是我又考了一次 GRE，考了 2220。在这个过程中，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新东方一直给我以精神的支持。比如新东方的老师不但课讲得精彩，而且他们也很有魅力，他们的经历也比较丰富，尤其是像俞敏洪和悠等，很有传奇色彩。

徐：实际上是由于你崇拜这些新东方老师，他们就对你有一种吸引力，他们能伴随你渡过人生很多艰难的学习时刻。

杜：对。尤其是在学习 GRE 时，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种孤独、寂寞的滋味。在这个过程中新东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没有让我感到很无助，很迷茫，它给我指出一条路，虽然我自己在这条路上孤独前进，虽然我走得很累，但却让我感到很踏实，因为我能看到希望。如果没有新东方，我出国的信心可能会没有这么强，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在年级排名中并不是很好，我之所以能申请到这么好的学校，要感谢新东方一直以来对我信心的培养。我是从西安来的，高考的分数很高，但到了北大后，看到周围的同学都很出色，我以前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在心里就会形成一种很大的落差。但来到新东方以后，我获得了一种成就感，尤其是考完 TOEFL 以后，我立刻对自己又有了信心。

徐：你对新东方哪位老师印象最深？

杜：宋昊，我很喜欢宋昊在课上给我们讲的一些笑话。

徐：我一直想听宋昊的课，但一直没有机会，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你曾在课上听到的笑话？

杜：比如有一次课上，为调节气氛，他曾给我们讲过一个关于签证的笑话。他说：有一次一个人摇着轮椅去签证，签证官问他，你怎么摇着轮椅进来？那个人痛哭流涕地说，我是一个残疾人，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我要出国学习，将来为残疾人的事业做贡献。签证官听完他的话很感动，就给了他签证。那人拿到签证以后高兴地摇着轮椅往外走，签证官看他摇着轮椅不方便，想帮助他。但那人出了使馆到了一个拐弯处后，马上从轮椅上站起来，飞快地跑了……（此时徐小平忍不住哈哈大笑）

徐：在讲课的过程中为调节气氛插入一些无伤大雅的笑话，这是新东方老师讲课的一个特点。

杜：另外新东方的出国氛围很好，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走到一起，共同奋斗。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1998年我在中关村礼堂上GRE班，当时天很冷。我记得一个班的课还没有结束，为了占到座位，另一个班的学生就已经在教室外排起了队，队伍排得很长，一直排得中关村化学所的正门。看着这个长队，我当时特别感动。记得当时有人看着排得这么长的队伍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路旁的一位大娘说：排这么长的队伍，这是干什么呢？大娘说：这帮孩子学英语呢，都要奔出国的。我当时觉得热情一下子就给调动起来了，中国很长时间没有一件事能让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投入这么大的热情。在新东方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很快乐，也很投入，可以说我把准备出国考试当作了目前的事业来看待。

到遥远的地方找寻生命之星

徐：你把准备出国考试当作事业来看待，你怎么看待出国这件事。或者有人认为出国留学是人才流失，你也是个人才，你也将要流失，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杜：出国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当我拿到 I-20 表以后，我就知道出国并不是我的目标，只是一个手段或者是一个过程。但我并不认为出国就是人才流失。人才流失指的是那些出去以后再也不回来的人，而不要针对那些将要出国的人，但我认为就是那些出去以后再也不回来的人，也不能称其为人才流失。留在国外不回来的人，他们也是在为中国做事情的。如果说出国留学是一种人才流失，那中国自清末以后，就一直在人才流失。中国没有人才流失的时候是在 1949—1979 年，但这段时间中国发展得最缓慢。中国如果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出国留学是一种人才流失，但把眼界放开，把中国放在一个国际舞台上来看，出国留学绝不能称为人才流失。中国的留学生毕业后虽然在美国工作，但同时也在把中国引向世界。美国人是通过中国的留学生认识中国的，中国留学生在这里为中美之间的交流起到了一个 bridge 的作用。我准备了很多介绍中国风光或歌曲的光盘，到了美国后我要把这些中国文化介绍给美国朋友，让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这样我就认为我不是一种流失，而是起到一个窗口的作用，美国人可以从我的身上看到中国。中国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只有 20 年的时间，所以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还需要更多的人出去宣传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台湾在六七十年代有大量的人出国留学，到了七八十年代又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台湾，所以台湾的发展很快。也可以说台湾地区的繁荣实际上和留学生的出国、归国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应该尊重人的选择,有更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判断中国是否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和过去相比,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中国向前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倒退 20 年,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不够。比如说我父亲那一代人,我父亲是老三届,高考那年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他那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而我们这一代人比他们那一代人要幸运多了,虽然也会有一些无奈,但总的来说选择的余地就比较大,比如说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可以上大学,也可能出国留学,而这在他们那一代是不可能的事。

徐:你是学纯理科专业的,毕业后在中国可能没有更大的发展机会,没有更大的发展机会才是真正的人才流失。但是你选择了出国之路,利用美国给你的 20 万美元到美国去留学,毕业后你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可以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又何乐而不为!下面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去美国要学习五年,那你如何把你的所学和你对祖国的爱结合起来?

杜:我看过一个北大中文系学生写的一本书,他在书中说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出国的人,出国的人再谈怎么爱国,也比不上那些在国内踏踏实实工作的人。这些在国内工作的人虽然一句爱国的话也不说,但他们是爱祖国的人。他写的这些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徐:如果按他的说法陈章良就属于比较不爱国的人,因为他出过国。周恩来、邓小平早年为了追求真理出国求学,如果按他的理论,那他们也是不爱国的。

杜:我觉得爱国或不爱国这个问题很空洞,我对这个问题比较幼稚的看法是,自己现在还比较年轻,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世界观,我出国留学到了美国,接触到美国人的思想或做事方法以后,我会回国,把我留学时学到的东西传给其他人,让那些没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人也能了解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思想。美

国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但美国之所以发达并不在于科学技术,而是在于他们有先进的思想,而我了解、认识他们这种思想,这也是我出国留学的一个目的。

徐:如果你不出国留学,你能实现你的梦想吗?

杜:如果不出国的话,我认为很难实现我的梦想。因为中国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都属于一种转型期,没有一个很稳定的环境。而且中国大多数人,尤其是在西安老家的人们,没有先进思想,大都比较保守。虽然我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学习了四年,但我认为还是没有接触到先进的思想。我在学校中接触比较多的只是一些化学仪器,和社会的接触并不是很多,这样我只能从单层次的想法去做我想做的事,而不能从纵面上去发挥我的作用,所以我有些不甘心,所以我要出国留学。

徐:你认为出国留学本质的意义在于什么?

杜:我觉得出国是一种追求。我看过美国的小说《在路上》,写的是美国一代人的生活。我记得书中的主人公说: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寻找我的生命之星。看完这本小说后,我突然觉得我也很想像美国人那样去追求,他们就是从美国的东海岸跑到西海岸,又从西海岸跑到东海岸。他们不是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在不停地奔跑,在不停的奔波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我觉得我也是一样,出国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经历,我要通过出国留学来寻找自己的梦想。

徐:你说你在国内要实现你的梦想很难,你认为难在哪里?

杜:难在我的家庭背景和我个人的性格。我父母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家庭背景,我的性格也不是那种混社会的人。在中国做一些事情比较难,这是我父母的社会经验告诉我的。

徐:我简单总结一下,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冲向中国,这时中国的留学生正在承担某种使命,因为当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时候,需要一些精英分子首先走向世界。你从北大毕业,又要

到美国一流的大学去读书,无论你去学什么专业,你们这些留学生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先导部队。杨振宁出国时只是西南联大颠沛流离的一名学生,但是他出国以后就成了杨振宁。他虽然没有回国,而且入了美国籍,但他对中国物理学的推动比哪一个留在国内或学成归国的人做出的贡献小呢?人们出国的理由千千万万,回国的理由也千千万万,一个社会只有允许人们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显得可爱。在北大建校100周年的大会上,牛津大学校长在大会上发言说:人们追求幸福的渴望和冲动,是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动力,而大学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渴望和冲动提供了一种手段和能力,这才是大学的意义所在。推而广之,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其实也就是在为人们追求幸福提供手段和能力。这是目前中国社会之所以前所未有的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一个原因。

出国、归国,做时代的播火者

杜:出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是希望自己有一个 open money,有一个更 international 的眼光,但从大的环境看这个问题,我做的事情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了。

徐:这是必然的。就像陈章良回国一样,他到了北大后把北大生物系那么多的科研成果都转化成了生产力。他从美国可能没有带来高科技,但是他带来了一种新思想,他给知识带来了尊严和价值,也许目前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

杜:无论是张朝阳还是陈章良,我觉得从他们这些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成功,只不过他们成功的地方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中国更适合自己的发展,于是他们回国了。他们虽然在中国创业,但他利用的是在外国学到的思想。比如张朝阳公司里的高级管理者在开会时都是用英语交

谈,他说,这是在国外学到的,如果把它译成中文,就会有一种夹生的感觉,所以他要用国外学到的思想来管理最优秀的人,办最优秀的企业。

徐:所以说陈章良哪怕是从美国回来后只带回了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冲动,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张朝阳回来中国,通过他的奋勇拼搏,唤醒了国人对 internet 的意识,把互联网带进了中国社会,使人人都知道了互联网及搜狐,这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江山代有才人出,就算搜狐公司以后知道的人不多,但是中国人对互联网的热情在张朝阳等人的努力下再也不会像黄河水一样出现断流的现象。

杜:对,他们的事例对我的启发很大。记得拿到签证以后我看《北京法源寺》,书中有一段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佛教讲回向。中国人信佛的都去出家遁世,这其实是对佛理解错了。实际上佛讲究入世,应该用佛学中所学的知识来改造社会。当初佛祖就是为了普渡众生才把自己献身的,所以信佛的人应该回向。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出去的目的是为学习,将来的方向还是要回来。就像俞老师在哈佛、耶鲁演讲时说的那样:想方设法走出去,千方百计走回来。

徐:张朝阳也好,陈章良也罢,当历史以后回顾他们的时候,无论他们成败,他们就是新时代的播火者。那么我问你,既然这样,是不是人人都得出国?

杜: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实际上人人都应出国,但不一定人人都能出国。

徐:我的观点就是人人都应出国一趟。我在温哥华的时候,街头看到穿着校服的日本学生一群一群地走过。那是条旅游街,整条街上都是日本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真正走向了世界。因为出国对日本人来说很简单。所以说,人人都应该出国,哪怕是去旅游,也要看一看世界是什么样子。但对中国大部分人来说,出

国就有些困难。首先是钱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国民的收入;其次是语言的问题,这就要涉及到国民的文化素质、教育水平。所以对中国来说,出国是每一个人的内在需求,但却是少数人的专利。出国是中国人向未来前进路上的一个前仆后继的事业,很多人在出国的过程中夭折了,但人们追求进步、繁荣、富有的梦想是不会停止的。一个人有这种冲动,一个民族也有这种冲动,而出国只是这种冲动的一种表现。

杜: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出国困难,主要是中国开放的时间太短,只有20年的时间,而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开放是从1993年修改留学生政策以后才开始的。在1993年以前,出国并不是很顺利的,比如要审查,要为国家工作几年以后才能出国等限制。但以后,出国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就像我们这代人出国再也不会像我父亲那辈人那样难了,而我们的下代人出国也可能会再也不会像我们这代人那样难了。

徐:所以,中国人出国最终会成为多数人的事情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最终中国也会像西方一样发达。世界在冲向中国,中国也必然会走向世界。

做北大的新知识分子

徐:下面谈一谈北大的校园生活,你认为北大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杜:我对北大印象最深的是北大的图书馆。我每次在图书馆的时候,总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总觉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看这些书,心中总有一种无知的惶惑。

徐:你喜欢读哪些书?

杜:比如像《在路上》等一些非常好的小说,还有一些有关哲学的书,如叔本华、尼采的著作等。

徐：你是学化学的，但你读这些书的时候是否有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

杜：有，但读这些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收获。而且从这些书中得到了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很珍贵的东西。

徐：作为社会的人，在北大的成长过程中你觉得有哪些重大的突破或比较关键的时刻？

杜：人生最重大的突破我觉得就是那次 TOEFL 考试。刚到北大的时候我也很自信，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自信可以说是一种自负的表现。到北大后看到周围的同学都比较强，心里就很失落，但通过那次 TOEFL 考试后我真正有了自信。从那次成功的考试中我得到一个启发，其实人和人都是一样，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比自己强就感到自卑或失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special 的地方，只不过 special 的地方不同而已。你只要通过努力能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那你就是一个有成就的人，这可能才是真正的自信。

徐：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政治的人，或作为当代的知识分子，你在北大的成长中有没有过一种顿悟？

杜：你问的话题我觉得比较沉重。我觉得这种顿悟我一直都在体会。我爷爷也是北大毕业的，他 1937 年毕业于北大英语系。但他却是中国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中国的每一次运动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他的头上有一块疤，是“文革”时被造反派打的。他今年已经 94 岁了，身体很好，去年的时候他得过一场大病，但他坚持下来了。他说他一定要活下去，要亲眼看我出国。他在西北大学教英语，直到 78 岁才退休，退休后一直坚持练字，看书，他喜欢把唐诗译成英语。他做学问的态度和做人的信念令我很敬佩。我父亲 1966 年高考的时候正赶上“文革”，耽误了 12 年，1978 年恢复高考后他才考上大学，在西北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一直当大学教师。他们都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不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我家的摆设很简单，家里最多的